

# 山西文史資料

第三輯

山西文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編  
山西人民出版社

# 山西文史資料

第三輯

(內部發行)

山西文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編  
山西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六二年·太原

# 山西文史資料

## 第三輯

山西文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編  
(內部發行)

\*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(太原井州路七號)

山西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晉出字第貳號

山西省新華書店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

太原印刷廠印刷

\*

開本：850×1168毫米 1/32·4 $\frac{3}{4}$ 印張·98,000字

一九六二年十月第一版

一九六三年十月太原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1—5,150冊

## 目 录

- 临汾四先烈与义和团……………侯少白(1)
- 山西交文惨案始末述……………尚 德(9)
- 辛亥革命时期新軍以外的各种力量……………南桂馨(12)
- 陆鍾琦父子被击毙和陆光熙政治面貌……………王定南(16)
- 姚以价是否同盟会員及其他……………大同市政协(20)
- 李歧山被害的一些情节……………定 南(22)
- 余燾給黄国樑的咨文……………(25)
- 黄国樑自述(遺稿)……………(27)
- 抗战以前的山西財政……………仇曾詒遺稿(30)
- 閩匪濫发晋鈔情况……………張邦彥(37)
- “綏西屯垦”見聞……………李志興(40)
- 河东革命記(續完)……………赵擎寰藏稿(48)
- 帝国主义扼杀山西义和团的罪証(續完)  
……………山西省天主教友爱国会 張茂先譯(105)

## 临汾四先烈与义和团

侯少白

道光十五年(即 1835 年),山西赵城县义士曹順曾举起反清复明大旗,率领该县人民占领县城,杀知县楊延亮,并派人襲取洪洞。时值临汾县城內正在举行府考,平阳府属十一州县童生均齐集临汾应考,試題揭示后,聞赵城起义,头人已到洪洞,各童生破門而出,有健者百数十人,赴洪洞参加,到則曹順已敗,头人均散走。此事虽似曇花一現,未能如曹順所願,但已在平阳府属人民心中发生很大的影响。这就是推翻清代王朝,成为人民內心深处的潜在意識。

道光二十年(即 1840 年)鴉片战争后,清廷与英国締結喪权辱国的条約,一方面暴露了清廷无能,一方面激发了人民种族革命思想,特别是在临汾四先烈意識中,留有深刻的印象。临汾四先烈即:董华、王得礼、陈某(佚其名)、董福田等四人。董福田、陈某年岁稍长,余二人皆系中年。董华、王得礼早年在駐临汾太原鎮标綠营曾作过千总、把总等官,对清廷对于滿汉两族显分畛域,頗感不平;而主管官太原鎮标参将春某,又系滿州人,顛預用事,賞罰不明,因此他二人即先后退职。董华退职后,在临汾城內关帝庙前大街開設月盛居飯館,乘机交結四方游俠;王得礼因窘于資,乃以赶轎車糊口,日在关帝庙前大街車市,招攬乘客。

因他过去与董华曾在綠营共事，故两人过从甚密。至陈某则精于医理，早年也因有反清嫌疑入狱。获釋后，即在关帝庙前大街月盛居飯館对門開設葯鋪，并为人治病。他与董华、王得礼二人相識后，交情渐深，犹如手足。此三人均不滿意清朝統治，虽有异志，苦无时机。时有董福田，以教书为业，为人正直仗义，有古游俠风。他不仅有讀書破万卷，下笔扫千軍的气概，而且富有民族观念，濃厚的爱国思想。他对学生講学时，除了講授四书五經外，特別喜愛講述历代民族英雄故事。如象宋代的岳飞、文天祥，明代史可法等英雄事迹，都是他对学生們經常談論的資料。尤其是对岳飞所作滿江紅詞中的“莫等閑，白了少年头，空悲切”这一句，更是把岳飞当年胸怀壮志，想驅逐金人，直搗黄龙，不要辜負大好年华的心情，繪形繪色地尽量描述。在当时异族君主专制积威之下，能有这样富有民族观念、爱国思想的私塾老师，确实也是不曾多見的。董福田不仅認真教学，为他的学生所信仰，而且对于地方公益事务，凡力所及者亦莫不尽力相助，或撰文以为号召，或出資以助其成，故在临汾紳士中享有极高之声誉。但因他素怀反清之志，所以在他交游之中亦特別注意有民族意識之人。恰好董华、王得礼、陈某等，久聞其名，并心仪其人，亟思与他相識，而他又常往月盛居用飯，遂得識董华、王得礼、陈某。他們所业虽有不同，但言談时事，臧否人物，則如出一轍，而对于吳三桂卖国求荣，引清入关；洪承疇畏死投降，为虎作倂，尤为深恶痛絕，是以頗相契投。

咸丰年間，太平天国定鼎南京，即遣林凤祥率师北伐。时有临汾人范二老，参加林軍。当林軍北上时，范二老因病返回临汾，得晤董福田，因对他說：林凤祥軍紀律极佳，所至秋毫无犯，

尤其是爱护人民，可惜言語隔閡，同人民情感上不易即時水乳交融。范二老又說：林軍扎營地方大門上写的是：“虎賁三千直入幽燕大地；龍飛九五重開堯舜鈞天”。這付對聯已使董福田聞之心醉。繼又听到二門上写的是：“重整大明新气象；掃除異族怪衣冠”。董听完后，不覺击节叹賞，这正是反映他反清的潜在意識。林凤祥北伐时，曾道經临汾。在他未到以前，派有前路偵探，伪装卖磁器挑販，先期到达临汾。其人自称由江西景德鎮販磁器北来求售，但售價甚昂，購者寥寥，販者亦不以为意。日間游行城內与近城各乡村，并在高敞屋宇或寺庙墙上写一个很大的草字，人皆不識，当时亦无人究詰之。不数月，林軍遂由河南怀庆济源入晋，直趋临汾，攻克平阳府城，并在前磁器客人所写草字地方扎营，清廷官吏尽数为林軍所杀。但对人民則特別优待，并无騷扰。董福田睹此情形，頗受鼓舞，大有投笔从戎之志。惜林軍在临汾駐的日期不多，即行北上，不久又在河北战敗，并为清将僧格林沁所害，太平天国在北方革命势力遂絕。但董福田反清之志願，仍隱藏在心灵深处，并未因此泯灭。

光緒庚子年，义和团起于山东，旋即蔓延于北方各省，山西省的义和团亦风起云涌，临汾亦不例外。董福田遂想借义和团之势，以达其反清之願，他就与董华、陈某、王得礼密謀說：义和团以扶清灭洋相号召，故能得清廷权貴支持，晋撫的贊助，这与我們所怀的反清宿願是大相逕庭的。但是义和团基本力量，都是些乡村农民，城市小販，这些人局限于“忠君”的思想，因而缺少民族意識，倘有人因势利导，并以滿人入关后，在揚州、嘉定等城市十日的大屠杀，不分男女老幼俱无幸免的殘酷事实，慘絕人寰的滔天罪行，以及清廷专用尸位素餐昏庸无識的滿人与亲貴

处理国事，不仅在条约上造成了不平等的束缚，而且在国土上引起了蚕食鲸吞的局面。我們把这些非反清不能救亡的情形告訴他們，这些朴质尚义的义和团与群众，就可能把“扶清灭洋”的大旗，改換为“反清驅洋”的大旗，这样我們四人的反清宿願岂不就容易达到嗎？这就是“拔赵帜易汉帜”的重演，你們其有意乎？董华、王得礼、陈某听了董福田这番話后，都非常贊同。于是董福田等四人遂共同集資二千余串，資助临汾的义和团，并与义和团首要人取得联系后，即在关帝庙租得西房三間，設立义和团临时支应处。同时，董福田等又与义和团首要人約明三事：一不得杀戮无辜教民及其家属；二不得焚燒貨物及房屋；三不得留难旅客。这些要求，义和团首要人全都接受。这样，事实上董福田等四人隱然控制了临汾义和团的全部行动，而临汾县人民乍見义和团的作风与初期迥然不同，且知此乃董福田等出資供应和劝导之力，故都称頌董等功德。此后临汾义和团不仅在城中遵守秩序，而且在乡村中亦不随便行动，并严格遵从上述三項約定。从此临汾城乡得免混乱現象。

先是山西巡撫毓賢是主張練習义和拳最力之人，故义和团在山西发动极为迅速，教会傳教士被义和团杀戮者有人，至于本省教民被杀戮者亦复不少。当临汾义和团起事时，笔者正在汾城县就学，适因麦假返回临汾，在襄陵县的灵柏村尖站小飯鋪休息的时候，看到由南来大蓬車一輛，坐着西洋少妇一人，年約三十岁上下，带有小孩三个。有穿安邑县护堂勇号衣四人，荷枪圍坐在旁。我就隨行隨問該勇，你們到何处去？他們說：我們的县官儿奉到省城毓撫台公文，着将运城教会洋人解送到省城保护，我們是解送洋人到省城的。他們沿路寄宿在所过各县監獄內，怕



是在路上店內为义和团杀害。我听了頗不了解。我在汾城听人傳說山东起了义和团，反洋人，反教民，杀貪官污吏，又听说洋人所在常向中国人用的水井內暗放药包，毒害中国人，所以山东百姓組織起义和团来保护大众，反对洋人。但是我看见大蓬車坐的那个少妇带着三个小孩，愁容满面，很是悲惨的样子。我想：既是这样的人，为什么要在井中放药包害中国人？由于我的好奇心驅使，因而我就特别注意义和团的行动。我到了临汾后，各村正在发动练习义和拳，青年們皆持枪弄棒提刀、游行活动。回至家中，先母見了我，很高兴的說：你再不回来我就要打发人接你，因为村中接奉东关义和团来信，正在組織练习义和拳公所。男子十七岁以上，必須入所练习。他們問我打听你的岁数，我說今年才十五岁。他們因为你身体长的高，不信，你明日到庙上對他們說明白，确系十五岁，并且有村中每年报有人口册可查。說完后你就回家来，明日可进城到亲戚家看你外祖母，路上有练拳的地方，最好不进去看。第二日我进城看亲友（我村距城五里在城东北），路过东关小东門內春牛場，有义和拳正在上馬练拳，約有数百人。首要人張姓（我忘其名）正在念咒后睡到地下，自称是西天古佛，下令道：現在外洋妖貨在城关商鋪內封存（山西撫台毓賢先有令各商鋪不得买卖洋貨，原有洋貨封存），并未銷毀，今日各村友团到齐，上街查焚外洋妖貨，不得有誤。張姓下令，由地下起来，查詢来的村庄与人数。有人答云：来到本团的有五十余村，約三千余人，排列整齐。張巡視后又派人傳知城关各鋪戶，迅將洋貨已封存未封存的均移放街中心，候大队到時当众焚毀。各商鋪不得藏匿，違者將該商鋪房屋貨物一概焚毀。大队向西順序前行，至东关西头广元基京广雜貨鋪門口，街中心有由广元

基移出的洋貨中有洋布、洋扣子、洋小兒玩具、洋燈、洋糖各物，約值銀三千餘兩，大隊到時，即舉行焚毀。大隊出東關西門進城東門，將城門內大街小洋貨鋪內的洋針、洋綫、洋火各零星物件移放街中心焚毀。繼至縣署西大街豫丰和京廣洋貨店門口，貨物在街中排列一大片，大隊到後，即時化為灰燼。豫丰和為臨汾最大的京洋雜貨店，洋貨最多，約值萬兩以上。豫丰和对過兩義公京廣洋貨鋪，在街心也堆了價值略同的洋貨，亦均照樣焚毀。大隊行至西頭平陽府知府衙門，知府名崇祥，滿洲人，穿着官服親自迎接西天古佛。張某告崇知府說，把南路解省洋人着臨汾縣送交東關春牛場本團，我們要問明白他在山西住的地方，扔過几包毒藥。問明白以後，當即交回。崇祥唯唯而退。大隊仍返東關春牛場散隊回村。

臨汾縣知縣李光斗，人極狡黠，為了避與義和團謀面，常借口出外公干。知府崇祥又老朽糊塗，臨汾縣治下的八鎮紳士，因官無主張，遇事均推諉不理，形成了無政府局面。各村義和團練習神拳的團眾，最需要的紅布與黃布頭巾，胸前“寫馬字”方布、旗布（團眾着黃者為黃團，紅者為紅團）用量不少，因團規不許索取村中分文，所用布匹或是自備，或是勸百姓自願捐助。起初尚可備置，後來人數越加越多，自備捐助均不能繼。自有董福田等所設義和團支應處成立後，才有了接濟。七月初，東關團又傳知各村團眾，在東關春牛場集合，西天古佛張某宣稱：有外縣來平陽洋人，在臨汾縣監獄管押，未交本團，李光斗暗中受賄八百兩將洋人放走，我們團眾要到臨汾縣衙門找李光斗，叫他把洋人追回，賄款退出。這時候到達東關有八十餘村，人數約七千餘眾，有范姓上馬下令道：今日到臨汾縣向李光斗要洋人。于是就

整隊西行到臨汾縣署。門者答稱：縣官未在衙門，他外出公干去了。詢究在何處，則答稱：不在鎮台衙門，就在知府衙門。范又領隊到知府衙門，找出崇祥說：你今天若不交出李光斗，追回洋人，退出賄款，今天就不能回衙門。崇祥無法應付此事，穿着靴帽袍褂，衣裳楚楚，隨着大隊步行。走至鎮台衙門，去找鎮台了結此事，適鎮台進省未返，參將某在署代理，由該參將在鎮署轅門外接見范領隊與團眾，並宣布說：我將寫信告知鎮台，請他派人迅速追回洋人，並找李光斗向團中交代，即請崇知府作保等語。崇祥答云：我可作保。團眾始返東關散隊。此後村中各團隊，每日向各村找尋奉教居民，強迫出教。有一日至城北十里樊家河村，命柏姓家中一老婦出教。該老婦信仰甚深，堅決拒絕出教，遂為團眾所殺，並殺老婦一兒，一四歲幼孫，房屋亦被焚毀。繼又在城內四鼓樓洞兒，將奉教王姓房院一所焚毀。當時王姓外出，未遭傷害。團眾終日在各村道路上盤查行人，遇面生可疑之人多方留難。行人裹足，農事多廢，四境不安，全县民眾頓成惶恐現象。這些情形，均為董福田等所熟知。自從董福田與義和團首要人約訂三事後，那些殺戮、焚燒、留難等現象均不再發生。董等之言行，在義和團團眾中漸樹有威信，而西天古佛張某及其得力助手范某亦多遇事就商。董福田即乘間對西天古佛張某說：清廷不綱，招致外患，彼以異族入主中夏，對我漢人，岐視殊甚，何不趁此中原多事之秋，高舉義旗反清，同時號召驅逐洋人，四方必然響應。張某聞之，頗為所動。正擬進一步籌劃間，不料有人將此段秘密洩漏，而為李光斗所聞，李即密報晉撫毓賢，指明董福田、董華、王得禮、陳某為土匪，密謀起事，獲准就地正法。庚子八月某夜，李光斗派人逮捕董福田等四人到縣，未經審理，

点名后即斬首府衙門前海子边，并头悬鼓楼示众。各乡村义和团众，正欲率队进城找李光斗并搶救董福田等，适有由京逃难归来乡人甚多，告以八国联軍攻到北京，皇帝、太后均逃难出走，北京义和团抵抗洋人，伤亡甚大。团众自行解散。

## 临汾义和团四先烈簡历

編者按：据临汾县政协委员范志淹来稿，介紹临汾义和团四先烈簡历如下：

**董福田** 死年五十余岁，是一有文化者。其人材长心細，勇敢好义。他的祖父是举人，門上挂有文魁匾額。光緒二十六年，参加义和团运动，被反动派杀害。家住东关小东門内。现在有后裔，子廷柱，过去曾充东关街长，临汾商务会文牘兼事务。孙效舒，現充太原医学院医生。

**董华** 死年三十岁，临胜居飯館厨工出身。住城内塘子口。参加义和团运动，为反动派杀害后，其妻与长子(名寿子)，因精神受刺激过烈，均瘋死，二子小寿，投井而死。现在絕后。

**王得礼** 住樊家河村，是个农人。死年約三十余岁。忙时务农，閑时在城内赶轎車。临时住姚家胡同，与上述二人同时牺牲。

**陈春**(有的說回春) 河南人，医生，就在現时临汾城内大礼堂对門山貨鋪内開設回春堂藥店。因参加义和团运动被反动派杀害。

## 山西交文慘案始末述

尚 德

一九〇九年，岁己酉，秋收告歉，麦种失时，交(城)文(水)两县农民，为了亡羊补牢，播种鸦片，当时虽有禁种之令，满清政治，不过一纸空文，既未家喻户晓，人民亦莫由而知。逾年庚戌，春雨及时，烟苗茁壮，未几，叶茂花繁，正喜收获在望，而镪烟之令遽頒。县衙因执行困难，为委卸责任计，先后呈报大吏。彼时，山西巡撫丁宝銓，聞报，即派新軍混成旅管带夏学津带兵前往，驻扎开栅鎮，帮同两县知县镪烟，分兵分段，督令根除。人民生死关头，环跪哀求，逾趋逾众。該夏学津鹵莽灭裂，不事陈兵劝导，寬猛兼施，反恃其为丁撫亲信(其妻姿容妖艳，人称夏姬，傳言拜丁为其义父，日常出入撫署，頗有誹議)，群众略事嘩噪，即操切从事，下令排枪射击，一刹那间，哭声震天，死伤群众三四十人，更威逼人民，持竿横扫，頃刻而尽。該夏学津自以功居其首，又有丁撫提拔，升官当在指日。詎料事为晋阳日报所聞，总編纂猗氏王用宾，以案情重大，即密囑崞县張树帜，阳曲蔣虎臣两人，馳赴肇事区域，实地察訪，归来按其所記，撰成紧要新聞，披露报端。丁撫見报，怒形于色，即傳报社总理猗氏刘綿訓，夤夜入署，作色諭曰：交文匪徒，聚众抗官，死伤多人，自有背景(暗指革命党人策动)，何得謂为禁烟肇事？尔为該社总理，应先将

此項新聞，妥為更正，此後不再亂登。并許以知府保升。當時劉雖有代表輿論身分，而以系法政學堂監督，處于丁撫制下，未便當面頂駁。歸來報社，與王等商談，咸以報紙為人民喉舌，人民遭此慘禍，事實俱在，豈能顛倒黑白，而歌功頌德，為吾等求榮者乎？當下決定：由劉登載啟事，辭去報社總理，在股東會未召開另選以前，其職權，暫由總編纂王用賓兼代；關於千真萬確之新聞，不惟不能予以更正，尤須視其演變如何，繼續刊登，以盡職責；至劉對法政學堂監督一職，亦留呈固辭。次日黎明，即登車離晉。此時報社理事，系萬泉李少白，亦因舉貢考職，請假赴京，所遺職務即由新兼總理委托報社發行人、虞鄉尙德兼代。是日報登啟事數則，又以王之筆名“蕤”刊登：“予欲無言”四字，欲以賂事緩和中，仍寓譏諷之意。丁撫見報，知劉已去，新聞亦未更正，大為震怒，首將張蔣兩訪事，拿交陽曲縣衙看管，并誣詔關於此案一向肯說話之諮議局議員臨晉張士秀，以“挾妓逞凶”罪名，捕交法庭，判處徒刑二年，解回原籍臨晉監獄執行。然而丁撫權威，鉗制輿論，僅能及于山西，而漢口“中西日報”，上海“申報”，北京“國風日報”，以及各埠報紙，對於此案無不尽情登載。更有外埠報紙，揭發丁與夏妻關係，而釀成此案者晉陽日報，亦于“微言”欄內，摘刊“營營青蠅，止于棘”，而刺之。丁撫此時，已知無法掩蓋，遂變本加厲。先將業已離晉之前晉陽日報社總理劉縣訓，專折奏參，意在造成山西黨錮，捕拿王、尙，轉移社會視聽。當時風聲鶴唳，王知不能立足，報亦再難繼續出版，遂由尙秘密送至石莊，寓迎賓旅館，立撰“正告山西諮議局”社論一文，內有“飢民之為匪徒，諸君之充議員，俱見宣統二年之山西，可謂之破天荒，可謂之循環紀念物也，”等語，文長數千言，刺盡當時不恤

民命之官紳，更為“微言”栏摘詩經原句“牆有茨，不可埽也，中冓之言，不可道也。”以刺丁撫。稿既脫，王即買票東渡赴日，尙則懷稿潛回太原，当晚發刊付印。發行后，亦即密赴北京，報亦從此停刊。丁撫見報，怒不可遏，正擬大興黨獄，以泄其憤，豈知事先已被御史胡思敬，以山西巡撫丁寶銓，辦理禁烟，措置失當，槍殺多人一案，專折奏參，上諭“交直隸總督陳夔龍徹查，擬議具奏”。丁撫見抄，氣焰方柔，雖多方彌縫，無如偽難亂真。旋奉上諭，丁撫調蘇，夏學津撤職，永不叙用。其直督查辦具奏，內容如何，不得而知，但若此巨案，竟爾如此了結，死難群眾，未聞如何撫恤，正義人士，均尙禁錮囹圄。丁撫去后，尙則急由北京返里，因與猗氏縣知縣賴慶榮有舊，始將王用賓之老父，由看守所提出，寄羈馬神庙，以示優待，又往返臨晉監獄，安慰張士秀者，亦非一次。直至辛亥革命軍興，太原光復，被禁之士，方始釋出，王亦先期回國，從事革命工作。一桩重大慘案，至此始告結束。

時隔四十余年，我雖事內之人，紀述或有遺漏，仍須就正于知者、賢者，而補充焉。

注：本文作者為山西文史研究館館員。

## 辛亥革命时期新軍以外的各种力量

南 桂 馨

在同盟会以前，兴中会自始就和广东的会党有着紧密的联系；华兴会之对于两湖会党，光复会之对于浙江会党，也同样保持着应有的联系。等到同盟会成立以后，仍然贯彻了这种策略，而且对会党以外的民間各种实力，也尽可能地加以吸引。南方如此，北方如陝、豫各省，也不例外。

但山西的情形，那就大不相同。在辛亥起义以前，运动的对象是新軍，酝酿的中心在太原，革命的領導人物，从未注意到各地方的实力。但在山西南、北、中路，却有一些存在的革命力量，而且在起义以后，也有过不同程度的革命表现。茲就我所经历和知道的各路实力，分述如下：

甲、北路方面：在辛亥革命前，崞县、忻州一带，有一种光棍組織。“光棍”这个名詞，很难給以相当的概念，仿佛它有勇敢不屈的精神，然不一定是正确的。例如他們見到不講理的人，敢于挺身而出斗争；他們失敗，不論受到对方怎样的惩治，絕不求饒。那时忻州、崞县組織戏班的很多，这些戏班，常年巡演于晋北及綏远等地，而且那里演剧，那里就有賭場。賭場的賭徒往往有些輸打贏要的，沒有保护者，賭場就繼續不下去。因此，光棍們就



到处受賭場的供養，作為他們的保護者；反之，如果賭場不供養他們，他們就變作賭徒，擾亂賭場。當然，光棍們活動的範圍，不完全局限於賭場，但賭場是他們的主要活動場所。以此，這些光棍們的勢力，就隨着戲班的巡行演出，從晉北達到了綏遠等地。光棍們雖然分散各地，然不是無組織的，那時他們的組織和領導者，就是崞縣人弓富魁。同盟會員崞縣人續桐溪，認為光棍們的力量可以幫助革命，從而和弓富魁結成深厚的友誼。弓就加入了革命陣營。在辛亥起義後，他們和五台的趙不廉成立了忻代寧公團，以千餘團員，幾百枝老毛瑟槍，智入大同，苦守了四十餘日，一方面牽制了宣化的清兵，一方面擴大了革命的聲勢。我在“辛亥革命前後的回憶”里已經寫過了，這裡從略。但很可說明，這支實力，對革命的幫助是很大的；而閻錫山在當時並沒有予以足夠的支持，這也是盡人皆知的。

其次，靈丘縣人杜上化，清末舉人出身，在鄉授徒。他看見清朝政治腐敗，不久必歸滅亡，倘能糾合一部分實力，以此為基礎，逐漸擴大，乘機揭竿而起，必能奪取部分政權。他鑒於漢代的五斗米道、清代的洪秀全等，都曾利用宗教，取得廣大人民的信奉，因而他也仿效這一辦法。他們村里有一牧人，經常有六朝僧人名“桂馥”（或貴佛）者，附到他的身上說些神話。杜上化就利用這個機會，給“桂馥”建了神廟，並且通過牧者之口，宣傳種種杜所想辦的事。因此，得到本村和鄰村農民的信仰，從而由近及遠，聯絡了五十多個村落，以聯莊會為名，組成了以杜為首的實力團體。意在推倒清朝之後，奪取山西政權，進而稱王稱帝。後來山西諮議局成立，杜被選為議員，又以他弟子們的擁護，當選為該局的副議長。漸漸聽到同盟會的革命學說，他很同情，從